

个人与时代

王三义

著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个人与时代

王三义

著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个人与时代 / 王三义著. -- 天津 : 天津社会科学
院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-7-5563-0516-2

I. ①个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世界史一文集 IV.
①K1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5253 号

个人与时代
GEREN YU SHIDAI

出版发行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出 版 人: 张博
地 址: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
邮 编: 300191
电话/传真: (022) 23360165 (总编室)
(022) 23075303 (发行科)

网 址: www.tass-tj.org.cn
印 刷: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: 13.5
字 数: 350 千字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68.00 元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现代社会,知识门类分化太细,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绝迹,因此,每个人要尽快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,至少应找到一小块阵地,先守住,然后图发展。年轻时就抱着高远的目标,在苍茫云雾中幻想,在交叉路口徘徊,在知识和信息的无边海洋中摸索,往往会空耗精力和时间,最后未必有收获。问题在于,常年埋头于一个小小的领域,深度可能是有了,但不知不觉,由博士变成“窄士”了,名为教授,但离开自己研究的领域,一张口就出错,“教授”二字变成笑话了。本人忝列教授行列,细究起来难免惶惑。

成为专家难,要“博学”难于上青天。有人提出,学问的最高境界是: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。这样的目标太高了,几乎够不着。记得一位大学历史老师说,他的理想不是成为史学家,而是成为思想家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年龄大约四十岁出头。他当时激情满怀,知识面宽,讲课很受学生欢迎,在学生眼里他很博学,也有思想深度,所以我们对他的豪言一点也不怀疑。26年过去了,他早已经退休,但没听说中国出了一位思想家就是他。20世纪80年代有一对学术夫妻,金观涛和刘青峰,他们从理科跨界到文科,既有思想,又有学问,那时读他们的作品,虽一知半解,但也受到激励,受到感染。他们后来在香港教书和写作二十多年,从香港的大学退休后,受聘于中国台湾的大学,从照片上看,他们当年的卓然丰采早已不见,变成了一位老大爷,一位老太太。偶然翻看金观涛的新书,

觉得不难懂,但理解起来也不轻松,当然,无论如何不像当年那么激动。

为什么这个时代难以造就思想家或理论家,好像有人专门写过文章。易中天有个说法:学问家什么时候都会有,思想家不是哪个时代都有;思想的产生需要时代的呼应,需要共鸣;一个人提出的想法得不到知识界认可和共鸣,这个思想家产生和没产生一样。简言之,理论家、思想家的产生,往往不是个人努力不努力的问题,关键要看环境和机遇。其实,造就学问家也不容易,真正的学问家数量也不会多。

单从历史这个学科来说,做好实证研究已难能可贵,要产生思想或者理论,概率较小。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史学家,但仅有刘知几和章学诚钻研史学方法论;西方史学家如云,但仅有柯林伍德、古奇、克罗齐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史学理论家。既然历史是无休止的探寻和查证,似乎无法用理论去指导。笼统地说,史学的理论是总结史学研究的经验而得出的,应该能够指导实践,其实不然,没有哪一位史学家的成果是依赖理论指导而产生的。

如何做研究,如何守住自己的“阵地”,不因外界诱惑太多而动摇,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。有一点是明确的:走别人铺好的路,不能解决自己思考的问题,但自己思考的问题,往往因知识储备不够,或因理论素养不够,或因判断力不强、分析能力不够,或因表达能力不强,难以做出像样的成果。对我来说,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,于是在专业学习之余努力去弥补。补着补着,大半辈子过去了,好像还没补齐。只能多读书,多读有思想深度的书。不敢夸口“见贤思齐”,至少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不断提高认识能力。

在读书和做研究的第一阶段,困惑很多,进展不大,断断续续把困惑和感悟写下来,凑成一本文集(《学问与饭碗》)出版了。在第二阶段,努力写了一些学术论文,出版了两三本书,但又想到,世界史的传播也重要,于是抽空把研究心得或者零星的读书感想写出来,也出版了一本文集(《兴废与进退》)。近两年写的随笔、杂感和小论文,还有三十余篇,话题涉及东西交流、人物评价、个人命运、思想见解、时代变迁等,再结集出版。

书名涉及“个人”“时代”,想表达我多年研究历史的感悟。我的着眼点,一是帝国的兴衰,一是历史人物评析。关于帝国,我了解较深且谈得上研究的只有

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。不过,我开设《帝国兴衰史》课程可以讲别人的观点,介绍他人的成果。这样,以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主,向前延伸到波斯帝国,向后延伸到西班牙殖民帝国和大英帝国,足以构成一个系列。关于外国历史人物,我较为熟悉的大部分是欧美国家的近现代人物。开设课程选讲和评析历史人物,最大的好处是选择余地大,历史人物那么多,常年讲也讲不完,可以毫不谦虚地告诉学生:每学期的课程内容都不重复。但要讲好每个历史人物谈何容易,必须博览,也必须研究。起初觉得,历史人物是“小题材”而帝国是“大题材”,渐渐发现,帝国虽大,研究“帝国兴衰”并非大事,历史人物虽是个体,但研究和评析历史人物难度不小,因为要涉及一个大时代。无论多么庞大的帝国,最终都灰飞烟灭,成为历史旧迹,帝国兴衰在历史长河中都是“小”事件。凡是史册上留名的人物,都不是大概率的,无论影响大小、贡献多少,值得记录总有理由,不可小看。帝国因个人的努力甚至牺牲而崛起,因个人的堕落而崩溃;制度和文化是单个人的创造的积累,因个人的坚守和保护而延续,因个人的破坏而扭曲或中断。个人再渺小再卑微,生命之于自己就是全部,故而“大”。个人命运和无数的“个人”的命运,反映“人类”的命运、“时代”的特征,故而更显其“大”。帝国无论多辉煌,衰亡了就是衰亡了,过去了就是过去了,不必赞叹,不必惋惜,不必苛责,只求了解而已。江山代代无穷已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求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景观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使命,人,自立于时代,也穿行于时代。

目 录

自序 / 1

辑一 西去东来

新时代从“荒”“僻”之地起步 / 3

黑海东头望大秦:历史的误会与正解 / 7

明月万里照旅人

——对“传教士来华”的理解和思考 / 13

参观大英博物馆后的感叹 / 18

“行走西欧”

——漫谈陈为人的欧洲游记 / 22

辑二 “人物”与人生

时代与个人命运：说不尽的塞万提斯 / 41

被后人苛责的戴克里先 / 45

布罗代尔：战俘营与成名作 / 49

不同境遇的人生

——我所理解的胡适、顾准和木心 / 55

不同时代的“酒公张先生” / 63

辑三 思想与见解

时代与世态人心

——雷海宗的思想和见解 / 69

何曾饶过岁月

——对木心哲学的感悟 / 81

帕慕克和木心笔下的城市百态

——以《伊斯坦布尔》和《上海赋》为依据 / 87

“文人”与“自然”

——读木心的《九月初九》 / 96

姚鼐的文章及教学生涯的启迪 / 100

理解之同情

——观《玄奘之路》所感 / 103

木心眼中的诗人拜伦 / 106

故里名人刘养锋的学识 / 110

长随新叶长新知

——《中东史》评述 / 115

辑四 细说“崛起”

大国崛起的成本

——以罗马史为证 / 127

大国崛起后的难题

——以奥斯曼帝国史为例 / 136

崛起的“奇迹”背后

——以近代西班牙史为例 / 142

从大国到强国的修炼

——以英帝国史为证 / 150

改制后的短暂辉煌

——以奥匈帝国为例 / 160

辑五 时代变迁

税收与人类社会的改变 / 173

东地中海国家税收制度研究的构想 / 177

跨越时代的司法权问题 / 181

“东方问题”的延续与终结 / 184

“19 世纪”宜细读不宜粗看 / 193

现代人与“古史”意识 / 196

土耳其道路的偶然与必然 / 199

辑一 西去东来

新时代从“荒”“僻”之地起步

世界近代史始于开辟新航路,跨越大西洋,而中国近代史是从广东掀开的,也印证了同一个判断。于是,关于海洋文明、地缘环境的话题总是说不完。

众所周知的逻辑是:资本主义文明是海洋文明,财富来源于海外。资本主义需要新文化,催生文艺复兴,需要解放思想,出现了宗教改革。资产阶级宣扬开拓创业,鼓励海外殖民。资本主义需要持续发展,颁布商法典、民法典,确立议会制度,调整利益分配。资本主义反过来刺激了商业竞争,扩大了世界市场。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,工业革命,军事科技,都是其结果。若是以“海洋文明”来解释,那么,中国近代史从广东写起的原因,就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广东靠海。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等的涌现,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广东人,海洋文明之风最先吹拂海疆。

从《顾准文集》中看到顾准评价孔子的一个观点:孔子周游列国,但他没有走对地方,鲁、宋、卫、陈、蔡等都是周的中心地区,文化已经衰落,难以重新振兴。战国的强国秦、晋和后来的赵、楚都是边远地区。中心故国,全被吞并。“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,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”。顾准还举例说,普鲁士、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,苏联和美国,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。受此启发,纵观史书所载,中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中,周、秦、隋唐、大清,要么崛起于西北,要么崛起于东北,很少有新国家从中原崛起并征服全国。再看世界历史,不仅仅大英帝国崛起于欧洲边缘之岛,西班牙是欧洲一角的半岛,俄罗斯帝国崛起于欧亚交界处,阿拉伯半岛兴起的国家相对于老帝国拜占庭,也处于边缘和偏僻之处。

中国古代历史舞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,几千年来岭南地区被视为蛮荒之地。两广和云贵在秦朝就纳入行政管辖,但处于大陆边缘,到宋代以至明代还是流放犯人的地方。中国正统王朝的统治重心转移,先是从东到西,例如西周(镐京)——东周(洛邑),西汉(长安)——东汉(洛阳),唐代(长安)——北宋(开封);后来出现南北移动,例如,西晋(洛阳)——东晋(建康),北宋(开封)——南宋(临安),元(大都)——明朝初期(应天)和后期(北京)。但清代末年的重大事件发生在南部沿海:1839年广州禁烟,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,1851年广东人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农民起义,洋务运动时期的福建和广东制造业,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变法倡议,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。

地缘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能否定的,因为它决定着经济模式、社会形态以及生活观念。

自斯宾格勒、汤因比之后,“文明”从地域上被划分为大河流域文明、草原文明、海洋文明等,以经济制度分为农业文明(农耕文明)、游牧文明、商业文明、工业文明等形态。长期的农业生产中,形成适应农业生产、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、礼俗制度和文化。但是,男耕女织,规模小,分工简单,产品不用于交换。世界古代文明中,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,两河流域的苏美尔—亚述—巴比伦文明,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,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,大致属于同一种类型——农耕文明。农耕文明是一种稳定的文明,它本质上需要顺应天命,需要守望田园,需要辛勤劳作,需要掌握农艺和园艺。在农业社会,不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,而是企盼风调雨顺。尽管农耕文明也有争斗和战乱,但不同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。农耕相对于游牧,优点是能从耕种和养殖中连续获得物质财富,拥有稳定的生活条件下,一些生活优裕的人去发展文化事业。文化知识的积累,反过来促使生产能力提高。以农业为主的社会,社会结构的变化幅度小,政治体制一般实行君主制,集权、专制、封闭、保守,经济发展缓慢。

世界古代文明中,在爱琴海范围的古希腊文明带有海洋文明的特征:海上贸易,商业竞争。居民从远古时代起就开始与海洋(尽管是近海)打交道,创造了与海洋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,形成相应的制度和观念。具体说来,造船、航行、贸易、竞争是必要掌握的技能,早期神话、风俗和生活常识都与海洋有关。希

希腊海岸线曲折、多岩石、少平原的地貌，造就了遍布于希腊地区的大小不等的城邦。生活方式多样化，利益多元化，因而不少城邦实行民主政治。古希腊人的闲适，与古代中国人的田园生活，是完全不同的。前者丰富多彩，后者平稳单调。海洋文明的开放性，和大陆文明的封闭性是其基本的差异。海洋文明主要得益于地缘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海洋文化。

外向发展是海洋文明的特征，这是由于本地物产不足以维持生计，必须与外族进行商品交换。罗马帝国扩大后，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，地中海周边向意大利半岛进贡，罗马变成一个帝国。罗马帝国农商并重，居民过着稳定的生活。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，西欧建立起封建制的国家，转向内陆，大部分依赖农业，商业的地位逐渐降低。而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国家，本来崛起于红海之滨，但朝着内陆发展，逐渐衰弱和分裂。意大利的威尼斯、热那亚、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兴起，得益于贸易，引领新的商业潮流。西欧封建国家逐渐衰落，经历黑死病等传染性疾病的袭击，欧洲大陆人口锐减，经济陷于困境。新航路开辟后地中海贸易让位于大西洋贸易，荷兰、英国依靠海外贸易和商业掠夺，迅速崛起，欧洲人的活动又一次从大陆转向海洋，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。

在开阔的世界视野下，西欧各国的精英人物们宣扬理性，批判专制，向荒诞迷信宣战，鼓吹天赋人权论，重新讨论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（古希腊伯里克利提出过），要求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秩序，主张用资产阶级法治和自由对抗暴君统治，在文化领域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。

反观中国，历史上的落后是由于祖宗留下的基业很大，不必外出、不需进取也能生存。自然条件好，比如适合灌溉，适合种植多样植物，适合饲养多种动物，适合发展手工业，能够养育众多的人口；而且，国土面积大，北方缺乏的南方可以补充，西边没有的东边可以供给；几条大河，全流域在本国控制之内，无水源之争。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的制度推行两千年，尤其重要的是，隋朝之后全国范围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，保证了制度和文化的结合。当一个朝代政治腐败、经济衰退、社会矛盾尖锐时，有人鼓动饥民起来造反，推翻旧王朝，由读书人出谋划策建立新王朝，而每个王朝的开国君主要进行制度调整，改朝换代而又延续旧制，保证了农业社会的大致平稳。清朝经历顺、康、雍、乾、嘉，维持约一百八十年

的和平(仅仅边疆有战事,三藩之乱持续时间不长),赋税相对较轻,老百姓大致生活安定,文化人因为文字狱不得不去钻研故纸堆里的学问,做考证、音韵、校勘,统治者吃饱喝足,寻欢作乐。整个社会处于懒洋洋的萎靡状态。

问题在于,中国人“做稳了奴隶”(鲁迅的话),过安乐日子的时候,1644—1820年正是西欧突飞猛进、日新月异的时期。英国制度变革、欧洲启蒙运动、法国大革命、工业革命、荷兰和法国英国海外殖民、俄罗斯大规模扩张、美国独立,这一系列剧变就在大清王朝全民酣睡时发生。直到欧洲大国主动找上门来,敲打大清帝国的国门。

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熟悉,不必多说。欧洲人“叩门”较早。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威德尔率舰队来澳门,要求贸易,澳门官员不许,便来到广州,广州官员不许,威德尔攻破岸上的炮台。后来经葡萄牙人斡旋,英国商人满载绸缎、瓷器而去。清初,英国商人不断来中国沿海。1699年清政府同意外国商人在广州设立货栈。其后英国、法国、瑞典、丹麦商人来沿海经商,沿海允许设商站的有几处,其中广州为最大的商埠。1753年,来广州贸易的欧洲商船27艘。1757年清政府下令只允许广州通商,其他港口关闭。四十年后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中国,求见乾隆皇帝,请求开放宁波、舟山、天津等港口,未得到允许。

海洋文明已持续几百年了,下一步,人类走向何处?回归大陆深处,还是走向海洋深处?如今地球那么“小”,何处是“荒”“僻”之地?

黑海东头望大秦：历史的误会与正解

王国维先生有一首诗：“西域纵横尽百城，张陈远略逊甘英。千秋壮观君知否，黑海东头望大秦。”诗中的“张”指敦煌太守张瑄，“陈”指尚书陈忠。诗中表达的豪迈气象，指汉朝甘英出使大秦（罗马帝国）。实际上，甘英没有到达黑海，看到的海是波斯湾。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早就考证过了。到达黑海和波斯湾的意义是不同的。罗马帝国控制黑海西岸和南岸，但不控制波斯湾，罗马和安息多次交战，没有打败安息，势力没有伸展到波斯湾。汉使甘英到黑海，才有可能和大秦取得联系。王国维先生不会料到，在他去世八十多年后，中国政府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使“中西交通史”研究持续升温。

（一）

无论王国维豪迈的诗，还是如今铺天盖地的“一带一路”宣传，都是活用历史资源，或者说，历史为现实提供依据。我不研究中西交通史，也不研究“丝路贸易史”，但这几年耳闻目睹，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，高居各类立项的基金项目榜首，国内高校和研究所，成立了不少丝绸之路研究院、“一带一路”研究中心，有的期刊还开辟了“一带一路”专栏。稍稍留意一下，发现了这样的现象：研究者或宣传者“将错就错”地使用历史资源。比如，说丝绸之路是古代的国家战略，又如，说通过“丝绸之路”的商品除了丝绸还有其他货物，再如，张骞之后两千年来，“丝绸之路”为欧亚贸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。